政大日本研究【第十三號】
2016 年 1 月，頁 153～190

大鹿卓小說中的殖民地台灣與樺太之再現
─以〈蕃婦〉與〈福壽草〉為例─

劉淑如*

中文摘要

本文以大鹿卓的小說〈蕃婦〉〈福壽草〉為例，探討其如何再現日治下的台灣與樺太的開發與殖民地主體日常生活實踐的關係，並考察其與殖民地統治策略的連動，以及文本中性別、階級、種族與自然意涵，如何呈現日本近代化下殖民地主體相互間性別權力關係。討論結果顯示，殖民地化雖為殖民者底層男性帶來社會階級向上層轉換的契機，但在國家與資本的威權下，其並未真正擺脫底層命運。其次，考察結果也顯現出人口流動與現代主體的形塑之間以及小說與時局之間的緊密連動。尤其，小說均發表於兩地受日治數十年後的重要歷史「事件」之後，也都側重於來自日本「內地」移民身心飽受折磨的描寫，據此小說可說具有一定之時代意義及社會關懷的面相。另外，作者也提出去人類中心的「綠色」省思，唯在台灣小說當中，作者乃以自然化台灣原住民為前提，這顯示作者並未超越民族主義的藩籬，也未脫離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上下階級意識。再者小說訴求的主要受害者為殖民者方的男性，相較下「女性」既被監管也無從發聲。最後，本文提出未來從多民族社會的觀點探討樺太文學，以及將與樺太文學的比較研究視為理解台灣文學史的新座標之思維。

關鍵字：台灣、樺太、殖民地開發、殖民地統治策略、現代主體、移民、去人類中心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lonial Taiwan and Karahuto in Ooshika Taku's Banpu and Hukujyusou

LIU, Shu-Ju*

Abstract

Focusing on Ooshika Taku's novels Banpu (Barbarian Woman) and Hukujyusou (Adonis Flow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nial evelopment in the Japanese colonies of Taiwan and Karahuto and the colonial subjects' practice of daily life. Also discussed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rategies of colonial rule and the ways in which gender, class, race, and ecology are expressed in the texts, which reveals the nature of gender power relations among colonial subjects under Japanese modernization. I show that although colonization brought the possibility fo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to male colonialists from the lower social classes, nationalism and capitalism conspired to keep most in the lower classes. The analysis show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flows and the molding of the modern subject, as well 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s and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time. Both novels were written following momentous historical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after each of the colonies had experienced decades of Japanese rule, and both focus on descriptions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uffering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addition to depicting the social concerns of the time, the author makes a case for an anti-anthropocentric "green" politics. In Banpu, this premise is based 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aboriginal Taiwanese, which shows that Ooshika had not overcome his nationalism or the hierarchical ideology of the colonialist. In addition, the author's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le colonialist as the main victim positions women as either controlled or silent. Finally, I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Karahuto literature from the multiracial society perspective, and suggest tha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Karahuto literature offer a new way to map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Keywords: Taiwan, Karahuto, Colon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olonial rule, Modern subject, Migrant worker, Anti-anthropocentrism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大鹿卓小説における植民地台湾と樺太の表象
—〈蕃婦〉〈福壽草〉を例として—

劉　淑如*

要旨

本稿は、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と樺太を舞台とする、大鹿卓氏の小説〈蕃婦〉と〈福壽草〉を対象に、それらの比較考察を行うものだ。まず実際の植民地政策が、両植民地の開拓にいかに施行され、当時の民衆の日常生活がいかなるものであったかを読み解く。そこからの考察の視点として、筆者はテキストにおけるジェンダー、階級、種族とナチュラルエコロジー的意味などを持ち、それらがいかに日本近代化の下での植民地で、複合的に性差別的権力関係を生んだのかに焦点をあてて論を進めた。結論として、植民地化という事態は、植民者側の底層たる出稼ぎ労働者の男性に上層へと栄進する機会をもたらす一方で、国家と資本の権威を前に、彼らが払拭できない底層出自の運命を彼らに再認識させる契機となることが、本稿によって明らかになった。一方、人口の流動と、現代の主体の形成とが密接にかかわっていることや、小説と時局とが密接に連動していることも、今回の検討で明らかになった。特にこれらの小説は、いずれも各植民地にとって重要な歴史的契機に発表され、日本人の流入によって旧植民地が現代化していく過程が詳らかにされており、歴史学的意義がある。と同時に旧植民地の受難に焦点を当てたものであり、読者たる我々は、当時の人々が感じた苦難を共感をもって追体験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ころが、作中の作者の思想について、彼は旧植民地の受難にその作品の題材を得たが、結局植民者と被植民者の階級意識を脱しきれていない。最後に本稿では、多数エスニック社会という観点の樺太文学研究における重要性を強調し、また今後樺太文学との比較研究が、台湾文学史を理解する上では重要であることを提言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台湾、樺太、植民地の開拓、植民地政策、現代の主体、出稼ぎ民、
非—人間中心主義

*国立宜蘭大学外国語文学学科兼任助理教授

大鹿卓小說中的殖民地台灣與樺太之再現
─以〈蕃婦〉與〈福壽草〉為例─

劉淑如

1.前言

日本著名的兒童文學者及小說家巖谷小波曾在他的殖民地口演童話行腳紀行文中的〈樺太印象記〉裡，用「既成品」與「未成品」形容戰前日本殖民地台灣與樺太在劃歸日本統治當時的總體狀況。巖谷之所以如此比較兩地，主要乃是為了替他在日本統治樺太近三十年後訪樺時，所深刻感受到的當地不時的「山火」與不絕的「惡路」，以及整體建設的落後現象緩頰。[1]而上述巖谷對殖民地台灣與樺太在建設概念下的「既成品」與「未成品」的評價，無論套用在戰前或戰後的兩個日本殖民地研究，可說均極為貼切。以樺太而言，其之所以大大有別於台灣，在戰前與戰後皆被排除在殖民地研究之外，主要除了受到資料上的制約外，也由於「日本殖民地史研究不是基於以搾取與支配為論點的帝國主義史觀，將『投資型殖民地』視為其主要的關心與分析對象；便是基於開發論及殖民地近代化論的觀點，視欲發展經濟的後殖民國家為對象」[2]。在此趨勢下，具強烈移住型殖民地屬性的樺太研究便持續被漠視。如此狀況雖在八〇年代出現多元的方法論，但情況並無太大變化。[3]相較下，台灣的日治時期研究雖在戰後也歷經過黑暗時代，但戰前豐富的研究蓄積與突破黑暗後的快速進展，再度拉大兩個殖民地研究在流動與相對概念下的「既成品」與「未成品」的

[1] 本文中的樺太，所指的是 1905 年日俄戰爭後，成為日本領土的南樺太。巖谷小波〈樺太印象記〉初出《木太刀》1929 年 9 月號，本文參考木原直彥對該印象記的要約。參見木原直彥、《樺太文学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1994、43-46。其中「既成品」與「未成品」的相關觀感及其脈絡，參見該書、46。

[2] 中山大将、《亜寒帯植民地樺太の移民社会形成―周縁的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植民地イデオロギー》、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4、14。

[3] 日本植民地研究会、《日本植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東京、アテネ社、2009、156。

間距。僅管如此，以文學領域而言，近年來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研究對象雖已由漢人作家作品擴大到日人作家作品，且其關心對象也擴及原住民世界，但仍多半聚焦於台灣境內。透過以東亞區域為平台，尤其以在戰前被日本視為「南國」與「北國」的「鎖鑰」的台灣與樺太這兩個分別受日本統治長達五十及四十年，且同樣具備島嶼屬性，也同樣曾被日本「內地」移民視為淘金寶島的殖民地為平台的越境比較研究，不但能擴展及深化日治時期兩地的文學研究，也有助於理解日本帝國文學的多元內涵。據此，本文將以日本作家大鹿卓於戰前所寫的以台灣與樺太為舞台的〈蕃婦〉(1931)與〈福壽草〉(1937)這兩篇小說為例，比較探討其對台灣（主要以「蕃界」為書寫空間）與樺太（主要以西海岸為書寫空間）的再現與詮釋，並考察其書寫策略與帝國在南北端殖民地的經營面向的呼應關係及彼此的歧異與交錯。

大鹿卓(1898－1958)出生於日本愛知縣，為詩人金子光晴之弟，曾在霧社事件後應台灣民眾黨之邀，代表日本全國大眾黨來台調查事件真相者之一的無產政治家河野密為其妹婿。幼年時曾隨雙親來台短暫居住，返日後曾就讀秋田鑛山專門學校冶金科與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並當過鑛山技師及化學教師。[4]早期以詩作為主，詩集《兵隊》(1926)曾被評為具有「奔放強烈的印象主義」風格；[5]其後專注小說創作，並師事佐藤春夫。小說群大致可分為以台灣山林為舞台的台灣小說，以及以日本東北、北海道、千島與樺太的自然為舞台的北海小說兩類，[6]後者以描寫鑛山勞動現場實態者居多，其次為海港勞動世界等。台灣小說中較廣為被討論並視為其代表作的〈野蠻人〉(1935)曾入選《中央公論》懸賞作品；[7]取材自日本公害原點的足尾銅山鑛毒事件的報導

4 大鹿卓生平主要參考河原功、〈大鹿卓《野蠻人》解說〉、《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 18〔台湾篇〕6 野蠻人》、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1－4；木原直彦、《樺太文学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1994、131。

5 浅見淵代表作者、〈解説〉、《現代日本文學全集 87 昭和小說集 (二)》、東京、筑摩書房、1958、413。

6 將大鹿卓的小說區分為台灣小說群與北海小說群的，是曾以〈地中海〉(1936)獲芥川賞的富沢有為男。詳見木原直彦、《樺太文学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1994、131。

7 〈野蠻人〉相關討論例如早期有川村湊、《南洋・樺太の日本文学》、東京、筑摩書房、1994；河原功、〈大鹿卓《野蛮人》解説〉、《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 18〔台湾篇〕6 野蠻人》、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荊子馨、《成為日本人》、台北、

文學《渡良瀬川》(1941)則曾獲得第五回新潮社文藝賞。作品關注於社會，具批判意識。本文將探討的〈蕃婦〉〈福壽草〉這兩篇小說，在先行研究中，有關〈蕃婦〉的部分，大多是被置放在大鹿卓的台灣小說的介紹中，或者在〈野蠻人〉的討論脈絡下略微提及，相關討論則主要聚焦於「野蠻性」的探討。[8]另外，具體針對〈蕃婦〉的探討，見簡中昊碩士論文。簡論文嘗試藉由通盤審視大鹿卓的台灣小說，分析作品群中呈現的殖民地問題。針對〈蕃婦〉的討論，簡主要是從殖民政策的角度，討論日本人男性與台灣原住民的異種族接觸，論文最後並提出作者以〈蕃婦〉為首的台灣小說所形塑的「蕃婦」形象，是當代相關形象中少數強調其「野生」形象的結論。如是，簡論文除留意到文本中呈現的種族問題、殖民體制下的階級問題外，也留意到殖民政策與殖民地主體的內面葛藤二者之間的影響關係。唯論文卻未就種族、階級與性別權力關係的交錯深入討論，亦未具體探究殖民地主體的內面與時代連動的背景。另外，簡論文雖也注意到了文本中對台灣山林的「自然」描寫，卻未能探究其與性別權力之間的關係，並僅視其為作者「寫實」作風下的一種呈現；再者關於「寫實」的評價，論者並未提供有效的支撐論述，亦未留意到文本中對於重要史實隱而未顯的書寫策略。[9]另外，關於〈野蠻人〉與發表在其之前的〈蕃婦〉，二者雖都觸及野蠻性的描寫，然而兩篇小說中的日本人男主角雖同樣來台從事警察工作，也與原住民女性通婚，但相對於前者的通婚是基於自由意志，後者則是被迫於無奈，這也使得後者多了一層以離鄉背井來台勞動的角度理解「蕃界」日本警察的觀察視角。另外，關於〈福壽草〉的討論，目前僅見於以浅見順為代表作者的小說集中的解說與木原直彥的著作。前者除了提出極地天候下的人性考驗觀之外，並提

麥田、2006 等。近期則有吳佩珍譯、阮斐娜著、《帝國的太陽下》、台北、麥田出版、2010；朱惠足、〈黃種人帝國的異種族「仇恨」與「親密」-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中外文學》第 41 卷第 3 期、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2012；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台湾近現代文学史》、東京、研文出版、2014 等。

[8] 同 7。

[9] 簡中昊、《大鹿卓の蕃地文学研究》、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学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出小說中呈現對現代文明絕望的視角，至於樺太在歷史與地政學上的意義，論者在極為有限的解說當中，則全然未提及。[10]後者部分，主要是從樺太文學史的角度介紹該作，並在篇幅同樣極為有限的評論當中，認為作者意在提出嚴峻天候條件下的男女愛情與道德倫理的省思，[11]此外別無他物。

然而，無論是〈蕃婦〉或〈福壽草〉，其書寫時間與空間都極具時代意涵。尤其，兩篇小說雖有著不同的殖民地時空背景，因而呈現不同的區域特色，卻也都與日本近代領土擴張及其所伴隨的新天地開拓與治理的背景密切相關，因而有許多相似與重疊之處。首先，兩篇小說均分別發表於日本治台／樺數十年後；小說發表前一年，兩地均歷經重要歷史「事件」：霧社事件（〈蕃婦〉）、樺太始政三十年紀念（〈福壽草〉）。其次，故事主軸中的男性皆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擴張過程中，被從帝國的「中心」驅離到「邊緣」的社會底層者，但他們卻在殖民地卻扮演起帝國代理人，擔任監管職務。另外，小說都是將男女關係做為殖民地主義下的殖民地勞動主體的生活實踐的衍生物－鄉愁的抒發出口，且都將故事中主要的男性描寫成受到勞動現場的女性們爭相愛慕與奪取的對象，如斯賦予其極大的主體位置。同時，小說中男女關係的展開，除了與殖民地這個特殊而具遮斷性的空間息息相關外，也都與帝國的殖民地開發與統治策略密不可分。且無論是台灣的山林或樺太的西海岸，小說中的自然不僅是故事的展演場，更帶有相對於文明與征服者之人類世界的原始野蠻、被征服者之非人類世界的意涵。最後，殖民地化對故事中男主角而言，如前所述看似象徵一種社會階級向上層轉換的契機，實則只是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換一片天空」作用的戲碼。他們也因此在歷經「底層－上層（想像）－底層」的心裡曲折後，先是呈現遭「去勢」後的無力感，接著展開形式不一的「抵抗」。故而值得探究的是，同樣在日治之下，兩地的開發統治與殖民地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的對應關係為何？對於殖民當局的治理開發策略，小說如何回應？文本中種族、階級、性別及自然等

[10] 同 5、414。
[11] 木原直彥、《樺太文学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1994、131-136。

意涵，如何呈現日本近代化下殖民地主體相互間性別權力關係？[12]

2.討伐與反抗的山世界：始政三十五年後的台灣書寫

〈蕃婦〉初出《作品》(1931)，後收錄於《海豹》（1933）及《野蛮人》(1936），後者於戰後並被復刻收錄於《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18〔台湾篇〕6　野蛮人》(ゆまに書房、2000）中。[13]小說內容主要乃圍繞著日本警察與台灣原住民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以及由此衍生的殖民地政治與社會的生活實踐如同化政策、文化衝突、男女關係乃至異族通婚等議題，以及這些議題的相互影響關係。文本雖明示以（新竹州大溪管內的）高岡社的討伐為背景，但從其發表時間與霧社事件僅隔一年，且作中亦明顯可見該事件的雛型，加以前已提及之，事件後曾來台調查的河野密為作者的妹婿等看來，二者應有相關性。故事從「蕃社」女子莎比莫那目睹同族女子雅各塔巴斯與住在隘寮宿舍裡的日本警察－富永同居的一個片段時，心生怨妒的描述開始。成為「蕃社」女子爭奪對象的富永，除了為兩女一再由愛生恨的惡作劇與復仇的紛擾所困之外，並懷抱對與女子同居一事東窗事發的恐懼。恐懼的來源極為複雜，除了部落與駐在所外，還有自己的內面壓力。如此恐懼終在某日以「突發事件」的形式正式浮上枱面，等待他去面對，此即由同居女子的頭目父親與駐在所所長共謀的一場為他與女子所設計的婚宴。面對這非自願的政策婚姻，富永曾努力嘗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最終卻在無法由衷認同這加諸於他的沉重命運之下，選擇以加入討伐原住民行列的形式做為反擊。過程中，富永的算計與被算計、「蕃丁」的角色與立場、頭目的掙扎與抉擇、「蕃婦」的兩難處境、富永的內面葛藤等，成為小說主要揭露的面向。

2.1 巡查的算計與被算計

如前所述，〈蕃婦〉以富永與頭目女兒同居的一幕展開，如此鋪

[12] 本文中關於〈蕃婦〉與〈福壽草〉的引文，皆為筆者自譯。
[13] 本文參考的小說文本為大鹿卓、〈蕃婦〉、河原功監修、《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 18〔台湾篇〕6 野蛮　人》、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3-32。

排，可說開門見山點出日本警察與原住民女性之間的男女關係在小說中的重要性。小說裡的富永，是在「內地」話的講習所內結識兩名原住民女性，之後他便「經常帶著兩人漫步在落日餘暉中的鄉村道上與河畔」[14]，過著三人行的愜意生活。如此關係看在「蕃丁」眼裡是極為礙眼的，這不僅因為種族競爭，更由於富永周旋於兩女之間那玩世不恭的樣態。每次接觸到「蕃丁」的銳利神情，富永便豎起敵意：「瞧他那表情！是否以為我會把她們怎麼樣？否則為何如此恨我！那滿頭發臭，腳上沾滿泥巴的傢伙！」[15]如是，富永與女子們的關係不僅加深了他與「蕃丁」的鴻溝，更擾亂了「蕃界」原有的和諧關係，而後者從小說中的莎比莫那為袒護富永，斥喝語帶譏諷的「蕃丁」的一段描寫，即可窺知。然而，僅管與女子的關係之於原住民男子是極其嚴肅的議題，但富永並未想娶女子為妻。正是這種雙方對感情觀的齟齬，為日後山中的紛擾埋下了種子。

對於富永無法娶台灣原住民女子為妻一點，小說稱道，這是因為他「聽說有很多警備員後來都拋棄多年的蕃妻，返回內地。一想到即將辜負那對自己單純的信賴，就令他難受。但也不能因此就娶蕃婦為妻，終生在蕃地度過，他還沒有這種心理準備」。[16]換言之，作者主張並非所有「蕃界」的日警都缺乏人性，其中也有像富永般深知自己不會與「蕃婦」白頭偕老，因此抗拒婚約的有良知者。在此前提下，作者並站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角度理解富永。小說寫道，富永既無法娶女子為妻，認真並長久經營「蕃界」生活；亦不願意「假結婚」，怕踐踏女子「天真爛漫」的心，所以才維持著有實無名的同居現狀。尤其在久未接觸本國女性的情況下，與眼前女子維持地下同居關係，對他而言是最有利的。唯天不從人願，富永終得付出代價，此即由駐在所所長代表的日本當局與女子的頭目父親代表的「蕃界」所「聯手策動」（如後所述，頭目並非出於自願）的一場由篝火、野味與燒酒串成的「蕃地」祝宴－小說以「事件」形容富永對這場婚宴的

[14] 同 13、5。
[15] 同 13、5-6。
[16] 同 13、6。

定義，由此足見通婚對他的衝擊之大，因為，這並不在他的生涯規劃裡。如是，作者主張日警也是政策下的受害者。

根據日本據台初期時任首相的松方正義所提出的〈台灣的實況〉報告，當時渡台的殖民者，大多是在內地難以生存的社會底層者。如此的評價並不僅出現在該報告中，在往後也成為一種定調。[17]小說雖未具體提及富永前往「蕃界」的背景，但可確定的是，富永並未有久居「蕃地」的想法，而此與前述許多日警在利用完「蕃」妻後，便將之拋棄返日的意義同，即無論「蕃婦」或「蕃地」，其之於日警，泰半是過渡性的存在。事實上，此種短視近利的移民根性，在日本領台初期便已經存在，當時不僅「對於被日本政府派遣到台灣總督府的官僚來說，台灣勤務只是一種地方勤務，他們莫不想早日回歸中央」[18]，一般百姓也都希望藉由「依附總督府，以收一攫千金之效益」[19]。而如此情況不僅延續到大正年間，例如反映二０年代初期台灣青年對民主與民族問題觀點的留日學生雜誌《台灣青年》(1920－1922)中，對在台內地人殖民者的主要批判點之一，便是其短視近利的心態；[20]且即便到了小說發表前後的昭和年間，也未嘗改變。以 1932 年 2 月號《理蕃之友》中一篇尾崎秀真投書的〈愛汝的鄉土吧！〉一文為例，作者從對日人在外語學習上還未學會走（母語）就想學飛（外語）的捨近求遠習性批判切入，向雜誌主要讀者之「蕃地」警察強調「長居久安」的「鄉土愛」精神之重要，藉以勸慰「理蕃人」若欲追求幸福人生，便要從其勤務及居住的山間僻壤中找出該精神，否則「山中勤務與鄉村生活將非常痛苦與寂寞」。尾崎並強調他經常透過演講向地方教員與「蕃界」警察強調此點，[21]可見過客心態嚴重影響「理蕃」甚至「治台」之一斑，因為正如同霧社事件隔年時任警務局長的井上英在《理蕃之友》創刊號所言，「理蕃乃台灣統治之根本問題」。[22]

17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東京、新曜社、2002、73。
18 同 17。
19 同 17、74。
20 同 17、 348。
21 尾崎秀真、〈汝の郷土を愛せよ〉、《理蕃の友》昭和 7 年 2 月號、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2、2-3。
22 井上英、〈理蕃の友に題す〉、《理蕃の友》創刊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理蕃」既如此重要，則「蕃界」警察之「任重道遠」，便無須贅言。小說裡寫道，富永在駐在所的工作主要是撰寫有關開墾地與樟樹的報告，聽取霧社交易所的物價表，並向埔里支庁請求補充火藥，以及與鄰近駐在所互通訊息等。另外，如前所述，他還得教原住民日語。小說提到，對於「蕃地」的生活，富永感到些許憂愁與埋怨，而這指的無非是前述繁瑣的職務與山間僻壤的生活環境，尤其小說還批判日語講習所的設備之簡陋。關於日本統治期間警察的職務，根據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灣的警察制度原是因應「土匪討伐」需求而生，「土匪平定」後，因下級行政機關的組織等不完備，警察機關便順勢被利用做為協助地方行政發展的單位之一，故而實際上支廳長警部等於郡長，而派出所的巡查就等於是町村長。也因此，台灣的警察是「一面持劍，一面捧著經典，在捕盜斷訟之餘還從事教育慈善」[23]事業。如此繁重的工作對來台的日本警察而言,應是始料未及的。另外，《理蕃之友》另一篇來自警察的投書也提到，「蕃山無一樣教人快樂的事，大家都無聊至極、苦不堪言，家書及報章雜誌成了最大的慰藉。話雖如此，但那也是一週或十天一次的事」，且「年輕巡查還得受性的問題所苦」[24]。年輕、單身、異國且還是位於深山僻壤不易「治理」的「蕃地」、繁重的職務、孤單寂寞的生活……，小說主張，這些都促使原住民女性成為日警尋求抒解工作與生活壓力的出口。唯一如小說中的富永，他原本只想安於現狀維持與「蕃婦」的同居關係，但事態卻演變到必須與其「和親」以利帝國的「理蕃」。或許正是這種從輕鬆玩樂到嚴肅使命的落差，也或許是因為涉及自身利益及有了更近距離的觀察，才使得他在執行這項「任重道遠」的「勤務」時，得以切身而認真思考當局的同化政策，並到達該政策之荒謬與流於形式的體悟。「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當女性問題刺激「蕃丁」，促使其反抗時，富永終須在「討伐蕃人」與「反抗政府」當中，擇一「大

理蕃課、1931、1。
[23] 矢内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1934、222-223。
[24] 高橋正男、〈理蕃人・新聞人〉、《理蕃の友》、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2、3。

義滅親」。「蕃妻」與政府：前者陷自己的命運於「悲慘」[25]之境；後者不斷令自己想起被賦予的使命之「卑微」與「沉重」[26]。小說在此揭露了扮演帝國與殖民地的中介、協商角色的日本警察的兩難處境與深深的無力感，且如後所述，此種無力感也出現在台灣原住民男女身上。

2.2.「蕃丁」的反抗與頭目的降服

小說中「蕃丁」的初登場，乃在於前述富永與女子們散步時與「蕃丁」不期而遇，彼時「蕃丁」與「蕃婦」互相嘲諷與斥喝的一幕。前已提及，富永與原住民女性的關係為「蕃丁」與富永衝突的原因之一，此除了種族競爭，亦與前述之日警未真心善待原住民女性有關。「今晚去哪裡？」，面對「蕃丁」語帶嘲諷的問候，未待富永出聲，莎比莫那立即以在講習所向富永學來的日語，要他少管閒事。「蕃丁被一這麼壓制，除了銳利的眼神，只有沉默」。小說並寫道，或許是因為「蕃丁」一身怒火，富永才保持「猛犬一般冷靜的態度」，而雖然富永訝異於女子的凶狠模樣，卻也「不禁小小得意了一下」。[27]上述描寫可說一語道盡「蕃界」裡混雜著殖民地階級、種族與性別意涵的感情構圖：占權勢上優勢及有「蕃婦」撐腰的日本警察、權勢感情都居劣勢的「蕃丁」、袒護日警，但又有被其拋棄之虞的「蕃婦」。如此構圖形成一種彼此制衡的關係，且只消一個引爆點便可令潛在的冰風暴一觸即發。小說中的顯性引爆點，乃是一名潘姓漢人隘勇對莎比莫那的一番令其不快的言詞，而這還只是莎比莫那為讓逮到她愛慕富永心思的頭目外甥魏浪尤諾轉移焦點，捏造出的謊言。「蕃丁」魏浪尤諾在小說被寫成「狂暴有如種牛」，他在聽聞莎比莫那對潘的抱怨後，立刻「伸手撫摸腰上的蕃刀握柄，嘴唇因此歪斜，眼裡還冒著怒火」[28]不久他便將潘馘首。小說還穿插一個他在面對警方一再嚴厲審問時無言以對，並在放開手中方才隨手抓來的青蛙，青蛙跳到一名巡查臉上後竊笑的橋段。這一方面形塑出原住民「原初」與「天真」之意象，一

[25] 同 13、9。
[26] 同 25。
[27] 同 13、6。
[28] 同 13、16。

方面也帶著些許黑色幽默，為小說將揭露的令原住民備感沉重的議題預埋伏筆－自聽完駐在所所長的話後的魏浪的反應描寫起，小說便轉而聚焦於原住民對日警的深仇大恨之內面感受。

小說寫道，魏浪「望著所長，眼神中充滿殺氣，當他欲伸手拿起桌上的蕃刀－那沾滿著模糊血肉的自己的蕃刀時，警備員們趕緊前往阻止，這時他也還以雌牙裂嘴的神色，以示威嚇」[29]。回到小屋一覺醒來，魏浪想起莎比莫那：「再也不會讓莎比莫那抱怨了，誰若還敢惹她生氣……激昂撼動著他的胸口，令他像馬一般氣息奔騰」，他「頂著槍口穿越樹林，沿途枝幹落滿一地，所到之處風起雲湧」[30]。遍尋不著莎比莫那的魏浪，失神地來到駐在所附近，而接下來的描寫，則具體而核心地告發原住民對日本警察的怨憤：

> 「窗外溢出的光，映照出他的雙腳，他隨即縮了回去。這黑暗中四處氾濫的駐在所的光，令魏浪尤諾感到有如充滿敵意的暴力。就是這旁若無人的威壓奪走了他的幸運，他才悲慘至此的！也由於他那隨心所欲與天真的自我，令他對壓迫感到無比的憎恨！憑靠在樹幹上，他用那憤怒顫抖的手，對著明亮的窗外扣下板機。槍火竄出的火光遮蔽了他的雙眼，那是靈魂的欣喜與雀躍。爆破音穿過樟樹葉叢，駐在所也不時傳來物品損壞的聲響。一股躍入其中的衝動，令他亢奮不已。……當燈火中浮現驚慌失措的警備員的身影時，他再度扣下板機。」[31]

至此可知，潘被出草只是個引子，作者主張真正足以釀成原住民反抗的，是長期以來日方對其全面的監控與欺壓。另外，小說中魏浪之所以縮回那被「窗外溢出的光」映照的雙腳，固然是基於對光所象徵的征服與監管的憎惡，亦未嘗不是將自身被現代文明社會異化的異端性與自卑感內化的結果。如是，作者主張種族競爭下處於弱勢的無力感與對自我存疑的內化，亦是原住民對日仇恨情結的來源之一。回到「起義」後的魏浪，他在倉皇之中逃入森林。魏浪的作為雖令部落不安，卻也振奮了部落。所有聚集在頭目家的男丁們那「胸中平日對晝間巡

[29] 同 13、19-20。
[30] 同 13、20。
[31] 同 13、21。

視各個小屋的警備員的反感與敵意全被喚醒」，之後其現身更加深眾人反抗的決心。面對蠢蠢欲動的「蕃丁」，在篝火映照下的頭目雖淡定地「望著周圍的亢奮」，但緊接著小說中一句雅各「感到此時父親深感困惑」[32]的描述，卻一針見血點出頭目的兩難心境。其實，頭目的困惑早在小說一開始時的那場野地婚宴中便已露出端倪。那晚頭目在小屋內對女兒訓斥一番後便將她推向富永，然後離開小屋繼續和「蕃丁」飲酒。小說當時寫道：「看他那樣子，似乎是想努力不去想小屋裡的事」[33]。身為「和蕃」通婚親家之一的頭目並非真心歡喜要將女兒嫁給日警，此由上文的節錄中便可窺知。女兒與日警同居，讓駐在所所長有機可趁、順水推舟，令頭目難以推辭，這應是頭目責備女兒之故（其中當然也有不放心）。而最後頭目不願想像小屋中的事之描述，更具體呈現頭目對通婚之千萬個不願意，但又不得不的深深無力感，因為正如同鄧相揚所言，在「理蕃」政策中，就以「和蕃」通婚帶給當事者及其後代的影響最大。[34]而在小說中，通婚只是頭目的困惑之始，當「蕃丁」們凝聚蜂起共識後，頭目再度困惑起來：

> 「外甥身上繼承著我的血液，也有著令人讚賞的意氣……。然而，我也知道許多蕃社因此滅亡的例子。若憑藉方才聚集在我周圍的族人那高昂的意氣一舉進攻，要攻下一個駐在所根本不成問題！但那並非真正的勝利……。他們一定會報仇，也一定會派其它蕃社的蕃丁打頭陣的，到時我們就得先跟他們一戰了。就是這種手段，造成鄰族蕃社滅亡了好幾個，而我們自己也被利用過好多次。像這次，九個族人都到高岡社去了，現在恐怕就有好幾個高岡社的女人及小孩正慘遭射殺……。」[35]

小說發表於霧社事件之後，事件得以提早結束，乃有賴於「味方蕃」的協助，然而事後證明，依附統治者並非王道。如是，小說藉由頭目另一困惑之內面描述，揭露日治下台灣原住民族被迫自相殘殺而漸滅亡的艱難困境。而頭目在考量大局後雖選擇降服，然其內面的壓

[32] 同 13、22。
[33] 同 13、7。
[34] 鄧相揚、《植民地台湾の原住民と日本人警察官の家族たち》、大阪、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2000、61-62。
[35] 同 13、23-24。

抑與憤懣最終也化為抗爭的動能。小說寫道，此時已箭在弦上的魏浪尤諾，見頭目欲以他一人性命為賭注前往降服，便偷走頭目的哨子「發狂似地猛吹。瞬間，各個小屋就像蜂巢般騷動起來」[36]。小說的戲劇性張力至此可說達到最高潮，而如後所述，頭目也加入討伐的行列。至此，小說試圖站在原住民的角度來理解其處境與反抗背景之用意，可說清楚不過，而這也使得小說看來極具人道主義的關懷色彩。然而誠如M·馬爾庫維奇論及工業文明社會下徹底人道化的可能時所言，「人道化的過程常常被膚淺地理解為對窮人和無依無靠者更加關切。於是人道主義就被狹隘地看作為制定救濟網領，消除物質貧困，消除飢餓和文盲，提高生活水平，制止殘忍的政治壓迫方式等等」，他並認為所有這些就廣義而言固然重要，但並非人道主義的本質，若欲達徹底人道化之境界，則須深入探究使人類遭到貶低的方式之根子，此即「在於那些壟斷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社會集團的存在」[37]。小說對於「理蕃」政策固然提出了批判，但形塑原住民為「隨心所欲的天真赤子」形象的書寫方式，實則不脫修辭的政治學，附和也強化了總督府「理蕃」的天經地義說，間接貶低了原住民。[38]加以小說在論及日治時期被台灣人稱之為「大人」（Daizin）[39]的警察之一的富永的在台職務時，其描述方式也極為枱面化；且也僅將日治下的台灣的種族衝突因素化約為單一的女性問題（小說名稱實已破題），巧妙迴避／遮蔽了日警與「理蕃」政策中最重要的山林資源的奪取之殖民地經濟榨取運作體系的關聯。尤其根據《台灣霧社事件調查書》，事件乃「帶有強烈的對日本在台長年的搾取與酷使行為的抵抗運動之色彩」[40]，其中尤以對原住民的勞役（大自道路橋樑整修，小至警察官家事等）最為人詬病，

36 同 13、24-25。
37 任立譯、H.馬庫色編著、《當代社會的攻擊性》、台北、南方叢書、1987、68-69。
38 關於日方對台灣原住民乃至整體台灣人所進行的「天真赤子」的修辭政治學的系譜，參照山路勝彥、《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中第三章〈植民地台湾と「子ども」のレトリック〉、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83-109。
39 黃昭堂、《台湾総督府》、台北、鴻儒堂、2003、236。
40 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編著、《霧社事件－台湾高砂族の蜂起》、台北、鴻儒堂、1988、164。

原因在於，日人使役其時經常不支付其酬勞；有不從者也經常對其從嚴懲處……。[41]然而，這些小說都視而不見。這也因此使得小說中的人道主義顯得未盡徹底。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蕃婦」的書寫裡。

2.3. 「蕃婦」的兩難與巡查的決意

當魏浪尤諾蜂起號角一響，一幅由老弱婦孺與家畜及糧食所構成的往密林深處移動的景象，瞬間劃破了山中的寂靜。雅各塔巴斯深知這是族人即將進攻駐在所的前兆。對她而言，一邊是族人，一邊是丈夫。她的「體內」固然流著與族人相同的血液，她的「體外」卻也染上與丈夫相同的文化色調：學習日本語、穿和服、用肥皂洗澡等。「和蕃雙棲」的她，天真的認為自己有居間協商的發揮空間，而這應也是政策婚姻的意義與價值之一。但就在她決意隻身前往駐在所時，卻傳來槍響：未待她發揮角色功能，雙方已開戰。茫然的她，只能無力地「以憎惡的眼神望聞穿越腳下的槍彈聲響」[42]。其實稍早前也發生過類似掙扎，即當魏浪尤諾襲擊駐在所，促成原住民男子決心反抗時，她在感受到父親困惑的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定位，並因而向父親表明欲以富永妻子之姿前往駐在所請求平息騷動。這意味她處在兩難框架裡，並欲在此框架內尋求解決之道。唯父親一句「笨蛋！妳要去哪裡！」[43]嚇阻了她，接著她便不知所以然地在眾人包圍下放聲大哭。

彼時的困惑，如今已釋疑，因槍聲已響起，戰爭就在眼前。此刻雅各塔巴斯才明白，真心換來的只是絕情。而這正是與猶豫道別的絕佳時刻，因為此時憑藉的只有直覺，再沒有顧慮的餘地與必要。除歷經同化經驗的雅各塔巴斯之外，通婚親家之一的頭目最後也選擇了族人。小說提到在烽火瀰漫下，雅各看見「蕃社」男子們縱火焚燒小屋後欲逃亡的身影，「其中一人正是父親……」[44]。小說如是再度直搗「理蕃」政策的問題核心，拆穿「和蕃」通婚的假面，並揭發殖民政策的

41 《現代史資料》22・台湾 2、1971。引用自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編著、《霧社事件ー台湾高砂族の蜂起》一書中之節錄。台北、鴻儒堂、1988、167。
42 同 13、26。
43 同 13、23。
44 同 13、26。

立基之脆弱：「裝腔（日語）作勢（衣著及禮儀作法等）」終不敵「渾然天成」（這也象徵民族主義的框架的更形鞏固）。然而，雖然雅各已在大局上選邊站，但這並非完結篇。選邊站後的雅各，再次對自我處境感到茫然：在大忠大義之後，她與日本丈夫的小情小義呢？她甚至產生幻覺，在駐在所陣營的警察及「蕃丁」大舉殺到時，驚恐中浮現富永的臉，並懷抱有人認出並救她的希望，唯末了她仍在戰火中受傷倒下。如是，在「反抗」與「討伐」之間，她念茲在茲的是丈夫，因為那之於她並非只是一樁政策婚姻，還是一份嚴肅的許諾、一頁真實的生命歷程。小說如是再度控訴日原雙方對婚約認知的落差，以及政策通婚悠關當事者一生命運，故其遺害可能更大更深更遠的面相。事實上，霧社事件中的莫那魯道之妹與佐塚愛祐之妻後來也確實都有過精神錯亂、意識不清的問題。[45]

另一方面，站在富永的立場，他先是歷經通婚與否的兩難，之後這個難局被「事件」[46]，即非出於他自願的政策通婚打破。但這並非終點，而是開啟他另一個難局的起點。婚後他被長官告知即將升官，對此他嗤之以鼻，因為「所有警察皆知，只要娶蕃婦為妻就可昇級，那是政策」[47]。小說除了對此「優待」表示嘲諷之外，更進一步敍述身為「受惠者」的感受。小說寫道，富永希望這場婚宴「是酒精作祟下的妄想」，因為這令他「悲憤、不快且憂鬱」。[48]尤其當他「憶起與蕃婦在一起的始末，便更深切體悟到，自己的一生被命運的坎坷、粗糙與謬誤給毀了」[49]。但同時他也嚴肅地感慨自己「曾如何努力將她改造成一個女人」，而「那也的確撫慰了他的神經」。如前所述，富永乃隻身來台，在山中生活苦悶、久又未接觸日本女性的前提下，透過對妻子的同化過程，鄉愁也因此稍得抒解。但同化令富永受挫，妻子「屢屢丟擲用不慣的筷子而改用手吃飯，那原本被撫慰的神經此時反而緊繃了起來」。同時他也體認到這些只是表面，且或許「自己想扶正枝

45 同 34、64-65。
46 同 13、6。
47 同 13、9。
48 同 13、8。
49 同 13、9。

葉，實則已折斷它；也或許因此妻子才失去昔日的生氣與光彩」。至此他甚至懷念起「彼時凭靠在日語講習所桌上妻子的模樣」，因為那之於他是極具魅力的。[50]此處將原住民女性影射為「歪斜枝葉」的書寫方式，與富永感嘆自己努力將妻子改造成「女人」所內建的「赤子觀」同，皆暴露出作者對原住民在本質上的歧視，這使得同情原住民被迫變成四不像的人本關懷大打折扣。另外，與對妻子「原始」之美的憑弔互為表裡的，是視其為相對於文化的自然的一部分，間接將之非人化，作者正是在此前提下，展開其反人類中心主義論調。相較下作者對富永也竭力釋出理解與同情，這也是貫穿小說的主題之一，像是小說後面還鋪陳當妻子告知富永將回娘家過夜後，富永「想到當晚可獨自入睡，瞬時鬆口氣」[51]的情節，藉此重申日警在同化任務中的壓力之大。但除此之外，並不見類似貶抑原住民的修辭裝置。

另外，小說也再度藉由富永婚後執行同化任務的經驗，彰顯該政策在現代性規範實作下的種種矛盾與牴觸。婚前，「蕃婦」女友怎麼看都有魅力；婚後，「外和內蕃」的妻子怎麼看都不順眼。就連「妻子」（實為莎比莫那）自娘家返回後身上所散發的「蕃味」，都觸動他憎惡的神經。這無非是因為富永受到異於婚前、近在呎尺的同化任務制約所致；也是「和」強加諸於「蕃」後導致的「蕃的畸變」，以及那能「撫慰神經」的「和」之於「蕃地」原味重現的挫敗所致。如是，追求純然的異國情調與鄉愁發散的雙重幻滅，形塑出頹喪無力的現代主體，而這也印證了布魯諾·拉圖所力陳的，「現代憲章」（Modern Constitution）雖藉由否認與忽視中介而成立，但實際上在其一系列的大分裂（Great Divide）後，枱面下仍充斥著「混種物」（Hybrid），並沒有各自為政、截然與純然的兩端。[52]

---

[50] 同 13、10。

[51] 同 13、10。

[52] 「現代憲章」（Modern Constitution）為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在檢討現代性（modernity）時的比喻用語。他認為，許多主客體、現代的我們與傳統的他者等現代性大分裂，均可類比為現代國家雖於憲法中明文規定司法與行政分立，但卻未能有效分隔雙方在律法條文以外密切的互動與關聯之情形。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布魯諾．拉圖、《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群學、2012、79-139。

前已提及，富永同時受到妻子與莎比莫那的愛慕，而後者在富永婚後仍對他示好。小說寫道，正是此類紛擾與同化壓力，才導致他選擇以加入討伐行列的方式做為逃避。如此將原住民女子塑造為向日警求愛的角色，與將日警參與「討伐」的原因歸諸壓力一樣，都有為日警卸責的味道。另外，小說末了在描述富永「討伐」當下的感受時寫道，身理上，天候與環境令他一度失憶，直至「一頭亂髮的蕃人手握蕃刀，齜牙裂嘴地迫近時」[53]，他才恐懼地扣下板機；心理上，「他一想到自己的手在無意識之中竟傳達了潛在的意志，便深感驚恐。而曾幾何時，這雙手早已無畏地抓著一頭亂髮、提著一顆頭顱」[54]。即，作者主張是內在恐懼、本能反應與潛在野性促使富永攻擊並出草原住民，而非受到殖民當局「切下一個蕃人頭顱即可獲得五十圓」[55]的懸賞刺激所致。這一方面突顯「理蕃」政策之忽略「人性」的荒謬；一方面從正面排除「罪惡的平庸」（奉旨出草）的可能性的手法，頗有挺身捍衛「野性」的尊嚴與尊貴之意味，象徵一種反人類中心主義，意圖挑戰主與客、社會與自然等現代性大分裂。尤其小說接著提到，富永想到此懸賞內容時，深感受辱。

值得留意的是，作者雖藉此展現理解原住民的誠意，但同時也未嘗非在主張日警亦為受害者。即，在「尊嚴野性」的前提下，若原住民的「蜂起」誠屬情有可原，則日警的「討伐」亦無可厚非。然而若就原住民與日警在政治權勢、階級與人權等之立足點並不平等的角度來思考，則「野性為雙方共有，故理解與同情也值得為雙方共享」的小說的主張，恐怕將使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由是，主客二元分裂的界限也將更加涇渭分明。川村湊在論及大鹿卓另一篇同屬日警對自身潛藏的前近代「野性」發覺系譜的、寫於〈蕃婦〉之後的小說〈野蠻人〉時曾提到，「大鹿卓這種對〈野蠻〉的發現，並非遵循欲藉由挖掘自身的野性以批判、超克西洋近代〈文明〉的軌道，而是只能用文

53 同 13、28。
54 同 13、29。
55 同 13、29。

明框架下的野蠻主義之主張做結尾」[56]。僅管小說並非只有野蠻主義－大鹿卓對〈野蠻人〉被視為純粹的野蠻主義亦感遺憾，[57]但就文明與野蠻的對立問題仍懸而未決一點而言，〈野蠻人〉如是；〈蕃婦〉亦如是。而堪稱帝國在台灣山中的代理人的富永，其所代表的來自日本社會底層的殖民者與母國及與台灣原住民的關係，也可說如實反映了當時日本在國際處境的兩義性。即「日本既是佔有其周邊區域的殖民帝國，也是將貧困的底層民以移民名義送出海外的弱小國家」。[58]

曾以小說〈地中海〉獲芥川賞的富沢有為男曾如是評論大鹿卓的台灣小說：「其南方物中必呈現反逆的熱情與奔放的意欲」。[59]富沢雖未說明「反逆熱情」與「奔放意欲」的持有主體，但作者顯然主張此乃為「蕃界人」所共有。尤其小說曾提出富永極度憎惡原住民的可能性，但最終排除之，這顯示，富永的出草（並非只是基於本能恐懼，扣下板機的殺人）對象在精神層面上或許並非原住民，而是誘發他野性的國家／政策。而這無非是因為「現代憲章」令他們變成「滑稽且悲慘」[60]的混種物，事後卻要求他們再濾過、純化（purification）使然。小說最後，既難以認同「理蕃」政策，出草後又因缺乏大義名分而無法泰然處之的富永，選擇了逃離「蕃地」。作者於此再度提出徘徊於現代性規範下的文化與自然兩端的人物像，並藉此人物像之受限於該規範而追求兩端未果後的痛楚，彰顯文化與自然的混合，以及自然與文化全面分離的現代的難局。

由上可知，作者乃試圖展現為所有「蕃界人」做「平衡報導」的人本關懷立場。霧社事件後，時任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長的桂長平在《理蕃之友》創刊號中，除反省日方「不察蕃情、蕃人操縱不當」外，更揭示未來「理蕃」當首重「統治者與原住民相互理解」之方針。[61]桂並

56 川村湊、《南洋・樺太の日本文学》、東京、筑摩書房、1994、38。
57 同 56。
58 同 17、75。
59 木原直彦、《樺太文学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1994、131。
60 川村湊在評論日本殖民地支配在其統治區域所造成的現象時的用語。川村認為，日本基於本文前述其國際處境的兩義性所衍生的情結，孕育出自大的文化排他愛國主義苗床，才造成如此結果。同 56、39。
61 桂長平、〈蕃人操縦〉、《理蕃の友》創刊号、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内、理蕃の友発行所、1932、6。

未提及具體方法，但從雜誌之後刊出的許多相關議論可知，所謂「相互理解」，實為一面透過讓原住民觀光都市或日本本國等，藉此向其展現「文明的日本」之國威；一面改變原住民文化，期使其從「殺伐原始的狩獵生活，轉向穩健踏實的農耕生活」。[62]就〈蕃婦〉所訴求的與原住民的「相互理解」，主要乃是建立在對日本「內地」來的警察移民的理解與關懷的基盤上一點而言，小說可說複製了前述官方的殖民者本體論立場，而這也使得文本企圖呈現的「平衡報導」徒具形式。

3.移民與鄉愁的冰雪界：始政三十年後的樺太書寫

〈福壽草〉初出《東陽》（1937），後收錄於《潛水夫》（新潮社、1937）、《千嶋丸》（人文書院、1939）、《野蠻人》(元元社、1955)、《現代日本文學全集 87　昭和小說集(二)》(筑摩書房、1958)等。[63]相對於〈蕃婦〉以南國台灣的熱帶山林為舞台，〈福壽草〉則是以北國樺太的亞寒帶海岸為背景。另外，相對於〈蕃婦〉書寫的最主要的「自然」為台灣原住民，〈福壽草〉則為酷寒雪地，且後者也未出現與原住民等異種族接觸的元素。這一點從出版於小說發表前不久出刊的《樺太廳施政三十年史》一書中，時任樺太廳長官的今村武志在序文當中所明示之，島上「幾乎無原住民，可視為內地的延長」[64]一點，或可窺其端倪。亦即，此乃與樺太的移住型殖民地之屬性，以及島上原住民並未若台灣原住民般，具有足以構成日本統治的障礙－取而代之的是亞寒帶的氣候屬性此一自然障礙－有關。故事以樺太西海岸的罐頭工廠、倉庫及女工與工頭井澤文藏等少數男性移民的小屋為場景，並在這群勞動生活共同體的互動下展開。過程中除帶出樺太西海岸特有的自然景觀與當地氣候所導致的季節性移民勞動實態，並呈現在此受限的勞動條件下衍生的粗劣的勞動環境，以及站在殖民地開發前線的勞動者的因應與自處之道。作中並細膩描述北緯五十度下流謫生活

62 斎田悟、〈蕃人観光の沿革と其の実績〉、《理蕃の友》1934 年 10 月号、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内、理蕃の友発行所、1934、5。
63 本文參考的小說文本為大鹿卓、〈福壽草〉、《現代日本文學全集 87　昭和小說集(二)》、東京、筑摩書房、1958、213－226。
64 今村武志、〈序文〉、《樺太廳施政三十年史》、樺太、樺太廳、1936。

的孤寂，哀訴暴露於嚴酷惡劣的自然及職場環境中的移民－尤其是女工們的異鄉悲鳴。與此軸線同時延展開來的，除了勞動團體的職場社會學，主要便是工頭井澤與女工的男女關係。

3.1. 「殘敗者」野鳥之死與樺太的漁業移民

小說由主角－勞動團體的工頭井澤文藏於連日狂風後的寧靜清晨步出小屋後的所見所聞與所感，揭開序幕。白樺原木搭建而成的簡易工寮、沾染魚腥味的厚重大衣、寒氣與哆嗦、暴風與海吶、小屋後方樹林傳來的斧鑿聲響等，標記了故事的舞台背景。緊接著，是井澤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視覺體驗：夜半猛烈撞擊玻璃窗後墜地的一隻野鳥之死。與此一意象交錯展開的，是數日後與以井澤為首的勞動團體切身相關的，由罐頭工廠、倉庫、女工小屋、工頭等男性領導階層的小屋等勞動與生活緊密相連的建物周圍的防風林之遭大自然的無情摧毀。失去防風林的庇護，傳來枕邊的海吶益發刺耳，接著則是「樺太西海岸特有的暴風」之來襲。野鳥之死在井澤的眼裡，包藏著大自然的用意；狂風肆虐後的折枝散葉，不但揭露「殘敗者」的痛楚，也加重了「瀰漫在廢墟般的樹林裡的殺氣」。[65]而與此環節緊緊相扣的，則是只能將命運交由飄搖的風雨恣意支配的移民及其小屋。小說中遭自然法則淘汰的野鳥的命運，可說就是井澤等移民的命格之隱喻，而故事接下來的敍述，也始終未脫離這個子題。

日俄戰爭的結果，使得樺太於 1905 年被納入日本版圖。有別於台灣，島上原住民並不多，總人口也相對稀薄，這使得島的開發須高度仰賴移民。根據 1937 年出版的樺太唯一的官廳誌《樺太廳報》第四號由松田清作所撰之〈樺太的勞動概況－其特殊性與調整之要務〉(以下簡稱「勞概」) 一文，「若將移民解釋為離開生活根據地去就業者」，島上的「勞務者可說全都是移民」[66]。松田並指出島上勞動界的兩大特徵：季節性與移動性。亦即，在自然上，由於該島的亞寒帶氣候屬性，造

[65] 同 63、213。
[66] 松田清作、〈樺太の労働事情ー殊にその特異性と調整の要務〉、《樺太廳報》第四號、樺太、樺太廳、1937、135。

成日照與勞動時間因此受限；在人為上，由於該島所具備的殖民地與新興地屬性，使得所有產業均包藏著動搖性。[67]這一點在戰後出版的口述歷史書《樺太的移民〈漁業篇〉》（以下簡稱《漁業篇》）中也多所被提及。編者並在該書序文裡提及雇用內幕：因業主本身不易募得勞力，故往往在訂定報酬後，請仲介協助。對業者而言，人頭數目才是重點，因此多半將移民生活的實態美化，其中也包括酬勞，這使得許多勞工一到現場發現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後，便設法逃離。另外，編者還提及惡劣的營生環境與勞力壓榨與拖欠工資等問題，並說這些在該地，「就像是家常便飯一樣」[68]。

在上述諸多問題當中，小說呈現了職場硬體環境的問題，前述建於窪地上的四棟小屋的相關記述即為其一。相關的描述還出現在井澤回憶與擔任會計的大槻六郎等男性領導階層引領四十名女工登陸時的記述裡。小說提到井澤一行人上陸後，發現小屋的門鎖斑駁生鏽，最後是在利用槌子敲壞門鎖後，才得以進入。另外，女工茂木在小說登場時的一段對於睡眠空間侷促擁擠的厭煩感的記述，也呈現出同樣的問題。換句話說，井澤等人面臨的不僅是嚴苛的自然條件，還有粗糙的人為職場環境。事實上，這並非只是小說中的情節，而是實存於樺太，且為其整體的問題。根據樺太移民－江戶八十八的經驗談，當時他住的位於樺太大泊市三沢漁場的「番屋」，就收容了他在內的七名勞工，他回憶，一群人在小屋裡共同起居，生活「相當克難」。[69]類似的告發，在日本普羅文學作家小林多喜二以報導文學的手法所寫的小說《蟹工船》中更是成為貫穿全文的關鍵字。小林以「糞壺」（kusotsubo）形容樺太漁夫的「穴」，而這是因為狹小的室內所匯集的人體臭味、煙味與空氣中混濁的氣味，使其有如糞坑一般使然。[70]小林更在該小說中直指，壓根就是船上工廠的蟹工船，「每一艘都破爛不堪」。[71]其它尚有「蛸

67 同 66、134-135。
68 野添憲治・田村憲一編、《樺太の出稼ぎ〈漁業編〉》、秋田、秋田書房、1978、8-9。
69 同 68、72-74。
70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　一九二八・三・一五》、東京、岩波文庫、1992、16-17。
71 同 70、28。

部屋」（takobeya，章魚小屋）的稱謂所象徵的惡劣的職場環境以及肉體勞動的過度被搾取。

如此個個的簡陋環境，形構出樺太充滿臨時性與輕浮感的整體建築風格。在 1939 年 10 月出版的《樺太時報》第三十號的山本祐弘〈樺太建築之我見〉一文中，作者提到該地建築予人一種「只是悄然立於寬廣大地的家屋」之感，缺乏「集體住宅式的戶村町」式的「立體」印象，而如此住居所呈現出的，乃是一種「在有嚴冬的自然中顯得極為浮躁的樣貌」與「稀薄的生活感」。作者甚至比較日人與俄人住居，進而得到「樺太尚未出現由日本人所蓋的耐寒住居」的結論。[72]同一問題在時任拓務研究會員與台灣日日新聞東京支社記者的「重松生」的〈樺太之我見〉一文中亦可見，作者更直言指出樺太的建設遭等閒視及其處於「被搾取者」地位之處境。[73]而這無非是佐伯怜三在《樺太時報・樺太島民的性格》所提及之瀰漫於樺太島上的「一攫千金的投機心理」[74]。佐伯雖未將投機心態的島民特定對象（階級）化，但無論從《漁業編》中移民的口述歷史，或從《蟹工船》中的相關記述來看，有能力建屋者無非是資本家，是而小說中惡劣職場環境的描述，也可說忠實呈現了殖民地下資本主義入侵的面相。

另外根據《漁業篇》，當時前往從事漁業勞動者，無論是家道中落或原本就須補貼家計者，均面臨在「內地」謀生不易的困境。這一點小說也有觸及，即女工在知悉入冬前若無法趕上最後一艘便船，就得留在小屋內過冬，直到隔年春季的流冰期之後，便陷入去留的兩難掙扎，因為她們都是分工場臨時招募的臨時工，回去便等同失業。事實上，這也是昭和年間世界經濟恐慌波及日本的一個史實。日本不僅因此股物價下滑、主要輸出品滯銷，中小企業相繼破產倒閉，數百萬人也因此失業。[75]同時，這也導致了家庭分工的變貌，日本社會學家上野

[72] 山本祐弘、〈樺太の建築を見る〉、《樺太時報》第 30 號、樺太、樺太廳、1939、83-84。
[73] 重松生、〈樺太を視て〉、《樺太時報》第 43 號、樺太、樺太廳、1940、98。
[74] 佐伯怜三、〈樺太島民の性格〉、《樺太時報》第 41 號、樺太、樺太廳、1940、20。
[75] 由井正臣、《大日本帝国の時代》、東京、岩波ジュニア新書、2000、123-124。

千鶴子就曾在論及昭和經濟恐慌下的家庭變革時指出，在此不景氣時期，「勞動市場雖然不能提供家長勞動者充分的就勞機會，卻開啟了一些雇用條件惡劣，只能讓『女人／兒童賺零用錢的工作』機會」[76]。另外根據昭和十年的國勢調查顯示，當時樺太的總戶數及人口較諸以往有增加趨勢，且其中許多漁業相關的移民均來自日本內地。這顯示出，對於昭和恐慌期的許多日人而言，樺太乃為一淘金逐夢之島。[77]〈福壽草〉中數十名女工之登場，以及關於女工面臨留下過冬與被解雇的兩難敍述，即呈現上述現象的一個面相。由此，前述遭自然淘汰的「殘敗者」－野鳥之死，不但暗喻移民的社會底層位階與命格之低微，也為後續其苦難預埋伏筆。

自然受限與資本主義下人為的險惡條件，不但造成移民缺乏勞動的隨興化，也構成其行動的外部極限。作中人物值此之際，除了像會計大槻六郎以賭做為鬱悶的排解之道，以及像總不避諱將思鄉心緒外顯的古田以閱讀家鄉老母的家書與不斷的淚水排遣鄉愁、抒發心情之外，也只能像有在島上過冬經驗的負責營繕的移民前輩－橫山老人，在面對樹木遭暴風摧毀倒塌時，以「可省去燒柴火用的伐木作業」[78]的自我消化之道，學習與自然和解，與自己和解，服膺自然的規律，依其運作而勞動。則是，大自然也將回饋以豐沛之姿，此即隨著故事的延展所呈現的，由連接到黝深的間宮海峽暴風不斷的樺太西海岸俯拾不盡的漂流物與海生物等所構築而成的當地獨特的景觀與自然生態的意象。小說中的大槻在嗜賭之餘，熱衷就地取材進行黏土等細工勞作、橫山老人身披樺太犬毛皮、茂木送井澤盆栽時用以裝盛的白樺木製容器等描寫，正呈現了人與自然緊密和諧的正向關係。另外，移民伴隨的鄉愁以及工作睡眠皆被集中管理的機械式生活，還有生活空間擁擠造成的侷促感與極近距離，不但使得這群勞動團體彼此產生緊密的連帶感，也成為滋生愛苗的溫床。小說以象徵愛願傳達媒介的植物「福

[76] 劉靜貞· 洪金珠譯、上野千鶴子著、《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台北、時報出版、1997、146。
[77] 野添憲治・田村憲一編、《樺太の出稼ぎ〈林業編〉》、秋田、秋田書房、1977、4。
[78] 同 63、213。

壽草」為名，即明白揭示了此一主題。

3. 2. 工頭井澤的課題與思鄉女工的悲鳴

男女關係做為小說重要主題之一的鋪陳，早在女工們正式登場前便已有跡可尋，此即在象徵寒冬將來臨前的小屋防風林被暴風吹倒的該日，橫山老人與井澤的對話。在橫山起頭道：「就快到你們消瘦的時候了……」後，井澤表現出「又來了！」[79]的不耐煩狀，於是橫山便說出自己對女工們之於井澤的冷酷評價與害怕感受的擔憂。接著，在井澤想起昨日男性小屋裡似有人進入後，橫山也回告自己亦曾發現大槻與女工同床共眠的跡象。之後從兩人的對話中可知，井澤似乎因為某種隱情，讓自己成為女性絕緣體。隨著故事的發展，小說進一步揭露此乃是井澤過去曾受到同為移民的女性造成的情傷所致。當時兩人都在北海道空知郡的某炭山工作，而該女子乃有夫之婦。就在兩人到札幌出遊後的某日，該女被抓回前夫處，自此他的心便被掏空，後遂應徵前來到現今的工作地。由上面的敍述可讀出兩個重要的訊息，其一為井澤的工作類別與地點並非單一固定而是多元變動的；其二為移民的男女關係之問題。關於前者，可說符合前述松田提及之樺太勞工高移動性的史實，而松田在該文中更斬釘截鐵地表示，島上包括漁業在內的相關產業，均「不可能定點勞動」[80]。《漁業編》中數名移民也都曾提到。例如，仲塚源吉原是前往從事鰊魚捕獲，但因該漁業有季節性限制，故漁業期一結束，他便前往真岡製紙工廠打工;[81]另外像三浦利七起初也是從事漁業，入冬後則入山從事伐木工作。[82]而此種勞動類別與地點的高度變動性固然與自然因素密切相關，亦未嘗不是投機心態的資本主義作用下的結果。至於男女問題，根據青山テツノ（tetsuno）的回憶，當時的移民有男有女，有單身也有已婚。因為睡覺小屋是採男在二樓女在一樓的合而為一的構造，因此女性在睡前多半會特別留意門鎖的問題，有時還會用大的包布塞住門縫，以預防男性進入。儘管如此，還是防不勝防，這也顯示女性當中，有人與男性互通款曲。

79 同 63、214。
80 同 66、135。
81 同 68、37-38。
82 同 68、87-88。

青山並強調，「男女共寢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事」[83]。

回到小說，小說在鋪陳井澤情事前情提要的同時，也進一步揭露上述樺太移民的男女關係的面相。就井澤而言，即使業種與現場變更，男女關係依舊成為課題；對井澤「前人妻女友」與留在島上過冬的女工來說，情況其實也一樣。之所以如此，或許未必是勞動男女的意志所能片面決定，而可能也是在前述的移民這種有著必須遠離既有的生活基盤，以及勞動與作息緊密結合，還有活動空間「地狹人稠」的問題的工作型態下的一個自然發展結果。尤其小說提到，若未能趕上冬天來臨前的最後便船，井澤及女工等人整個冬天都將被雪所困住。此種自然與空間上的侷限與時間上的餘裕，使得後續井澤與女工的男女關係的成立更順理成章。關於未能及時返鄉而留下「越年」（過冬）一點，前述青山的回憶中亦曾提及，[84]而小說後續的發展便是以此為背景，此即「越年」小屋中思鄉女工的悲鳴與前述令井澤糾結的女性問題。在此同時，鐵則一般冷酷無情的自然依舊以不同的樣貌考驗著勞動男女，形塑小說另一個以殖民地開拓先鋒對文明意義與價值詰問的人類對文明的反命題之側面。

小說中女工之登場，始自某日女工們集體就寢後的夜半中一幕敍述。隨後小說便開門見山點出女工思鄉的問題：「就寢時一面望著梁柱懸掛的石油燈，一面惦記著家鄉的她們，現在也都睡著了」[85]。緊接著是女工茂木的登場。小說在描述她起身添加柴火時的一段受困於屋裡同事們打鼾、磨牙等令她感到陰暗晦澀的聲響，以及屋外的陰暗帶來的寂寞與不安感，還有肌膚直接感受到的由粉雪所象徵的自然的摧殘時的被世界與自然嫌惡、遺棄的感覺之後，便聚焦於女工們的思鄉諸相。外顯者如古田因此變得神經質，經常幻想便船的到來，而過度思鄉者也一再選擇相信她患得患失下的說辭，其結果則是一再失望。壓抑組以矢島與茂木為代表，前者表面上是茂木派，不屑古田，實則與古田一樣思鄉；後者在知悉原本同陣營的矢島與古田等人並無異，且

83 同 68、19-20。
84 同 68、19。
85 同 63、215。

尚有歸國選擇的餘地後，更做出化被背叛後的心寒與焦躁、羨慕與嫉妒為偷竊的脫序行為。然而，即使有歸國選擇餘地者，也須面臨兩種殘酷現實的夾擊。小說中寫道，女工們得知近期最後一艘便船將到，若趕不上就得留下過冬後，「莫不失去內心的平衡，連血液循環都亂了步調」[86]。因為留下過冬將受到嚴酷自然的考驗與更添鄉愁的折磨；而歸國則可能立即面臨失業的壓力。此種糾結帶來的折磨，未必好過殘留組。如此的兩難在某日午後象徵與開放的外部及家鄉連結的便船迴航的一刻，終被似箭歸心收編，並被赤裸呈現以思鄉心切之百態：

> 「當汽笛響徹雲霄，女工們拋下手中握著的鮭魚肉和刀子，一度奔向出口擠成一團。此時不時傳來被推倒的人所發出的悲鳴，還有那腳底下滾落著的鐵罐駭人的金屬聲。狂奔於嚴寒的粉雪中的她們，就這樣在悲泣般的哀鳴聲中，一路朝山丘奔去。頭髮、眉毛、耳根都覆蓋著粉雪的她們排排站在山丘上，引頸企盼。冰雪似乎也為那無止盡的痛苦發出呻吟，而大海已被阻絕在黑暗之外，唯瞬間仍可瞥見遠方船上的燈火。此時可見有人隻手環抱落葉松的樹幹，揮舞著手帕；有人聲嘶力竭地大喊；還有人蹲著用雙手遮住臉龐，各種愚蠢的姿態就這樣反覆而赤裸地呈現在他人面前。」[87]

故事後續雖未具體交代歸國組回國細節，但從其後敍述可知，不久近半數能回國者，還是搭上最後一班船回去了。爾來殘留組落寞的陰霾揮之不去，而「日復一日嚴酷的自然，更加深了她們內訌」[88]。此處的內訌，乃始於前述茂木的偷竊行為及井澤接受她「非偷為借」的辯解之輕輕看過的處理方式所引發眾人的譁然與不滿。小說當時寫道，「井澤雖看穿她拙劣的計謀，卻也不能隨便當場斥責她。最後他就在自己也因此得救的心情之下，鑽過一群體臭女工的身軀揚長而去」[89]。井澤之得救，無非源自其惻隱之心，而事實上小說也數度鋪陳井澤的惻隱之心，例如先前他原本對大槻嗜賭不以為然，之後卻從北緯五十度下流謫生活極其孤寂的角度予以理解、寬容看待。另外，在幫浦凍

86 同 63、216。
87 同 63、216-217。
88 同 63、218。
89 同 63、217-218。

結的某日，他在驚訝於自然的鐵則之宣告另一階段的來臨時，也對於女工們胸中那飽受自然威脅的感觸心有戚戚焉。還有，歸國者回去後他為免殘留者觸景生情，連忙收起歸國者留下的作業服。即，井澤認為在嚴酷的自然條件及思鄉心切的情況下，茂木之舉與大槻的嗜賭同樣都是情有可原的，也因此他寧可搭茂木謊言的順風車，也不願違反自己的惻隱之心，向她開鍘。另外，井澤的得救若從後續井澤與茂木的男女關係之成立來看，則亦可將之放在井澤在對女性關係卻步後的破冰（伏筆）之層面來理解。井澤如是再度面臨男女關係的課題，而這也是小說意圖揭露的另一主要面相。

3. 3. 工頭井澤「意志的敗北」與「越年小屋」最後的純情

如前所述，基於惻隱之心，井澤不忍苛責同事的賭與偷之行為。而既然賭與偷都能被寬容，則情之為物，相較下既具正當性，且在封閉性的勞動空間(小自小屋大至島)與嚴厲的自然條件及時間之流下，它的傾瀉似乎也是極為自然的發展。小說中將井澤推向一個壓抑的臨界點的描述，出現在某日橫山老人號召勞動男女到外頭汲取海水的一幕：

> 「男人利用槌子在厚重的冰層上鑿出青黑洞穴，從中汲取海水；女人則拉著雪橇往返於白雪紛紛的冰雪路途。雪停後，遠方海上碎冰船駛過後悄悄堆起的冰山在暗灰的天空下，益發顯得清晰可見，其中包藏著無限被凝結的怨怒。不久，冰山動了起來，白色火燄般的雪迸發而出，形成漩渦，不一會兒的功夫，滿滿的雪花覆蓋在男男女女的頭上。此時文蔵衝動地想朝冰山狂奔而去，他的雙腳蓄勢待發……然而就在這時，他才意識到隱藏在衝動當中的某種絕望……。」[90]

再說，井澤的性格「平時雖然沉穩，但只要出現某一個點，他就會顯現出偏執的一面，這是他的致命傷」[91]。前已提及，井澤之所以對女工們築起一道感情防火牆，是因為受到過去失敗經驗的制約。因此，在上述這種臨界點之下，若有人主動投懷送抱（另一個「點」)，則他那

[90] 同 63、218。
[91] 同 63、219。

將情阻擋在外的意志，就更容易遭到瓦解。正當橫山意味深長地向井澤提及日前女工小屋發生爭奪歸國女工留下的畫（根據之後女工們的性經驗閒談，其內容極可能與性有關）的內訌，並暗示自己已無力再處理這些紛爭，因此希望井澤重新思考對待女工的「策略」後，文蔵的回應不但宣告他與過去的我訣別的事實，更因此得知他被雇用的內幕，並導致他有了另一決意：「我已改變宗旨接受了某人」[92]。接著在井澤一番解釋－並非利用茂木贖罪心理，而是基於想幫茂木沖淡偷竊罪名與想安慰她的這種救贖心理－之後，橫山的回應震驚了井澤。橫山向井澤駁斥完贖罪說後，除要他別鍾情茂木而應「多多益善」，因如此「工廠才會有活力」[93]外；更道出他受雇的絕大因素乃與此相關之內幕。井澤聽完雖心如刀割，卻也驚覺到自己確實是同情著女工的。亦即，井澤發現他的作為就和雇主的期待沒兩樣！小說接著寫道：「在這冰雪界的一角，戀情無疑也會遭凍結，但性欲卻不只是性欲。在深深覺悟之後，井澤暗自下了一個決定」[94]。

「性欲不只是性欲」，乃因其中摻雜了許多元素：孤寂、絕望、同情、贖罪（井澤說法），以及策略、任務。另外，井澤的決意由小說的結果來看，乍看下只是守護純情；但若從井澤再度接受另一女工村山主動示好後的某日，村山在哭訴自己因此受到茂木對她「不懂小屋規矩」的嗆聲時，也發出前往井澤小屋者不只她一人的怨嗟，並抬起「哀傷溼潤的雙眼」看文蔵，而文蔵「避開了她的視線」[95]的敍述來看，文蔵似乎在接受村山之後，還有著與其它女工恣意縱情的經歷。亦即文蔵得知自己是雇主的一顆棋子後，曾歷經消沉，包括村山在內，一開始都還是處在遊戲人間的抗議中。這一點由小說在敍述他回應茂木對村山有否特別待遇之詰問時的虛答中即可窺知：「我不認為自己對誰有特別待遇，因為我不能只愛一個女人！」[96]如此的自我放逐直到茂木送上象徵愛意的福壽草，井澤經過一段時日的觀賞與省思，以及藉由在

92 同 63、219。
93 同 63、220。
94 同 63、220。
95 同 63、223。
96 同 63、223。

得知村山知情福壽草一事並失蹤後的自己對村山的心意的發現，才被轉換為另一種具積極意義的覺醒與「反抗」的面相：鍾情於村山。

此時小說又鋪陳井澤收到大槻「讓渡」村山的談判要求，以及兩人談判時，井澤瞥見大槻與另一名女工共處一室，還有大槻在談判時供出他在前一職場也發生過二男協商一女歸屬權的橋段。至此，小說似乎意圖一舉掀開樺太「越年小屋」的帷幕，揭發裡面紊亂的男女關係。這也襯托出井澤再度選擇相信愛情，並欲專一守護它的意志之難能可貴。井澤說道：「kiyo 是越年小屋最後的純情，我必須守護」[97]。值得留意的是，這純情不但有別於前述贖罪與惻隱之心「交相賊」下的混雜物，亦是專一的。換言之，守護純情乃象徵對某種「策略」的抵抗、一種覺醒後的意志展現。小說中有關井澤雇用內幕，除橫山的供述，其餘並未見如來自雇主或國家的相關鋪陳。然而根據〈勞概〉，當時島上勞力的引入雖放任業者恣意而為，資本關係的來源卻多半隸屬官廳。[98]尤其，井澤等人從事的鮭魚罐頭加工業既是當時島上三大產業之一的漁業附屬產業，[99]鮭、鱒罐頭加工又與螃蟹罐頭加工並列為當時日本「輸出水產罐頭加工中的雙璧」，肩負賺取外匯，以改善戰時日本國際借貸之重任。[100]因此《蟹工船》中明示之工頭背後存在的國家、資本與軍隊（作中驅逐艦的介入是因反抗而顯在化）三方的權力，未必不存在井澤背後。唯小說無論就勞動團體的職場環境問題的揭露，或就女工失業風險問題的點出，始終都維持含蓄的基調，且此基調即便到了小說末尾處理井澤亦為資本主義下的受害者時亦未改變。即，小說不但未進一步說明資方雇用策略之詳細，就連井澤的反抗形式，也僅呈現出與前述那種伸展不開來的書寫方式相對應的「情定村山」的小格局。這極有別於〈蕃婦〉中直搗殖民政策本質的作風與富永用生命奮起的反攻氣勢。這一點若從〈福壽草〉發表時，日本文壇才歷經普羅文學崩解，「轉向文學」紛紛出現，不久中日戰爭爆發，爾來言

97 同 63、225。
98 同 66、137。
99 同 66、135。
100 遠藤忠至、〈蟹が缶詰めになるまで〉、《樺太時報》第 36 號、樺太、樺太廳、1940、70。

論自由漸受彈壓等角度觀之，或許不難理解。尤其，作者曾經從充滿孤獨、懷疑與不安的時代環境的角度，如下說明與〈福壽草〉同期的另一篇小說〈潛水夫〉(《中央公論》、1936）的創作背景（隔年〈福壽草〉也收錄在小說集《潛水夫》(新潮社）裡)：

「在此時代背景及環境下，人們最後能相信以及最終想抓住的真實，應該就是友誼和男女之間的愛情吧！且人們那早被懷疑所腐蝕的心，使得即便是自認已握在手中的愛情，最終也只能任由懷疑處置。這既是人類心理的妖媚，也是近代人引以為豪的心理的精緻與驕恣，但同時也是一種必然要承受的刑罰。」[101]

另外，在〈福壽草〉發表前夕，殖民當局才剛剛出版《樺太始政三十年史》以慶祝始政三十週年，而從時任樺太廳長的今村武志在該書序文當中的一段話，更可窺知〈福壽草〉之與時局呼應的面相：

「我們正在邁向拓殖十五年計畫的確實實施的途中，大大有所躍進，也名符其實成為北邊的生命線與皇國在北門的鎖鑰。這固然是官民堅忍北陬窮荒祁寒與拮据經營的勞苦所致，更是皇化的功績……吾人將究明其沿革與前人探險開拓的足跡，以感念其功勞；亦將把開拓中的樺太之姿公諸於世，鞏固永遠的基石，並清楚揭示島的未來趨勢及呈現官民共同奮起勉勵的情況，以回應聖旨。」[102]

所謂的拓殖十五年計畫，是由拓務省內部的樺太拓殖調查委員會在 1934 年 5 月所擬訂的計畫，其成立的前提是基於對滿洲事變後，滿洲加速的產業開發之危機意識，意圖以振興農業與水產業的方式，獲得森林收入的替代財源，以防止森林遭到過度的開發。[103]姑且不論結果當局仍然未能擺脫森林依存的困境，且三〇年代戰時下的樺太在經濟上也加速了資源供給基地化，[104]可以確知的是，融合了人類與自然的艱苦搏鬥,以及漁業附屬的水產加工業的移民勞動等元素在內的〈福壽草〉,就題材而言可說並未悖離時局。僅管如此，小說最後藉由象徵

101 同 5、414。
102 同 64。
103 三木理史、〈1930 年代の樺太における石炭業〉、《アジア経済》第 46 巻第 5 号、2005、3-5。
104 同 103、2。

帶來希望的、以及讓這群勞動團體興奮地知道，自己還與這個世界有所關聯的雪橇聲的出現，不但試圖再度突顯島的封閉與遮斷性；同時也使得小說的視野瞬間從「越年」小屋裡的小情小愛，拖曳到由雪橇並非前來喜報佳音而是請求分食的這樣的結局所呈現出的，對自然的難以違抗，以及「對現代文明深深的絕望感」[105]此一較大視野。尤其小說結尾處，在村山告訴井澤真想搭上雪橇離開後，作者追加了村山並非真的相信願望可實現的說明，如此的鋪排與〈蓄婦〉同樣都是一種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否定。

4.結論

本文以大鹿卓的〈蓄婦〉與〈福壽草〉這兩篇小說為對象，探討小說如何再現日治下的兩個殖民地台灣與樺太的開發統治與殖民地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對應關係，並考察小說與殖民當局的治理策略之間的連動情形，以及文本中的性別、階級、種族與自然生態意涵如何呈現日本近代化下殖民地主體相互間性別權力關係。本文的討論顯示出，殖民地化對於故事中的男主角們而言，不但是工作與生活場域轉換的契機，也是社會階級向上層轉換的契機。只是，原本單純想在殖民地一攫千金的謀生營為，卻因為國家／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盤算，或使其人生產生偌大變化；或使其私生活受到干涉限制。日本經濟學家桑原靖夫曾在《跨越國境的勞工》一書中指出，「即便地球再小，出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對於許多勞工而言，這是他們首次前往語言及生活方式皆不同的國家，因此，在出發前就需要相當的決心」[106]。此種前往海外的行前思忖與異域生活必然伴隨的地理與自然、社會與文化的適應，及工作本身的壓力、浮雲遊子的鄉愁等等，均使得海外勞動顯得益發艱困。尤其小說中的男主角們均歷經從殖民母國的社會底層，轉而在殖民地升格為監管階級，但之後卻又驚覺到自身的矛盾處境：他們之於被監管者雖為上層；但在國家／資本的威權之下，卻依舊只是被擺佈的下層。如此「上沖下洗」的結果，形塑出充

105 同 5。
106 桑原靖夫、《国境を超える労働者》、東京、岩波新書、1991、23。

滿無力感與內面葛藤的現代主體，而如此的情節也與日本當時對內雖為殖民強國，對外卻是輸出日勞的弱國之國際處境不謀而合。這既驗證了人口流動與現代主體的形塑之間的密切關聯，也顯示出小說與社會及時局的緊密連動。

另外，本文的討論也顯示出，小說對於殖民當局的治理方策，乃是立足於質疑與批判的立場，而這主要的切入點，乃是「台灣錢淹腳目」、「樺太，淘金島」此一渡台／樺的日本移民乃至國家整體「一攫千金」的過客心態。亦即，小說所提出的，是與日本帝國對兩個殖民地的統治態度連動的人物像，而這些人物則以殖民開拓（自然）先鋒的受害者之姿，直接承受國家整體短視近利的統治心態下的遺害。尤其，兩篇小說都寫於兩個殖民地受日治數十年後，也都寫於對兩個殖民地而言皆具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後不久，且小說諸多篇幅也都在描寫置身惡劣人治與天候環境下的移民，其身心飽受磨難的異地生活。據此，小說所提出的對殖民地開拓治理上的省思，不僅具有社會關懷的面相，也具有一定之時代意義。另外，若就兩篇小說的結局：富永逃離「蕃地」（〈蕃婦〉）、村山做足繼續坐困愁「島」的心理準備（〈福壽草〉）而言，則小說除了呈現出日本尚未消逝的前近代性在面對文明時的情結與掙扎外，也充滿對被「過度開發」的「自然」的反撲現象與宏偉難敵的力量所萌生的具「綠色意識」的「去人類中心」的省思與覺醒。唯值得留意的是，對於兩個殖民地的征服，〈蕃婦〉著重於對台灣原住民的統治面相；〈福壽草〉則側重於與嚴寒自然的搏鬥面相。如此看似前者重人而後者重物的圖式，在前者將台灣原住民「自然」／「非人」化的書寫裝置前提下，最終也都匯集到了對「自然」的征服此一框架內。作者正是奠基於此立場，提出其對「自然」過度「開發」的省思與警告此一具有生態意涵的反人類中心主義。即，作者並未超然於民族主義的藩籬之外，也始終未脫離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上下階級意識。

另一方面，邱貴芬曾以周蕾在探討「中國性」時提出的「階級意識」此一批判性介入點中存在的，抗拒的、被迫害者的位置已被男性無產階級所占據，相對下中國女性則缺少發言位置的事象為例，對台

灣文學的問題也提出同樣的反省。邱認為，「在建立台灣文學為國家文學的工程當中，我們訴諸的是『被殖民者』群起反抗殖民壓迫，建立自己主體性的過程；在這當中，由於占據這個被殖民者的或是受害者位置的往往是男性，女性往往無從發聲」[107]。而由本文的討論也顯示出，大鹿卓的〈蕃婦〉與〈福壽草〉這兩篇小說所訴求的最主要與最大的受害者：富永與文蔵，他們不僅是男性，還是殖民者方的男性。相較之下，文本中的「女性」雖也獲得了作者的同情，但其存在的主要價值與意義，乃是為了彰顯「男性」受害的源頭與面相。故而，若井澤文蔵等人所代表的日本人移民是「奴隸」[108]，被迫就地喪失故鄉的台灣原住民所代表的台灣人的處境則更加不堪，因為「她們」既被監管，也無從發聲。

當前移民甚至因宗教戰亂等所導致難民的增加等，使得人口流動成為與生態並列的全球性議題。Howard Fast 曾在其小說《The Immigrants》(1977)裡寫道，「移民們對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具有深切的知覺性。他們並不夢想自己成為歷史的一部份」[109]。然而事實上，人口流動不僅改變了歷史景觀，還有族群景觀、文化景觀、意識型態（政治）景觀、經濟的複雜性，[110]以及生態景觀等。本文的討論亦顯示，日本殖民時期人口及資訊由帝國中心向邊緣流動的結果，也深深影響了接受端的上述諸景觀之面貌。向來的大鹿卓小說研究，在台灣小說的部分，大多聚焦於對殖民地下的「野蠻性」之探討，以及台灣境內；在與台灣同樣曾為戰前日本殖民地的樺太的小說的部分，相較下其相關討論則仍屬於「未成品」。然而，首先，由本文的考察可知，無論是台灣小說〈蕃婦〉或是樺太小說〈福壽草〉，二者不僅同樣有著殖民地治理開發的時代背景；也同樣存在著對跨界離散的移民的關懷視線，而後者的觀點，透過兩篇小說的比較考察，其輪廓也更顯清晰。

107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2003、136-137。
108 日本秋田縣出身的漁業移民笠原市蔵在陳述其前往北海道及樺太從事農、漁業勞動的經驗時，做出「移民勞工等同奴隸」的結論。同 68、119-130。
109 張時譯、法斯特著、《移民》、台北、皇冠雜誌社、1978、11。
110 鄭義愷譯、阿君・阿帕度萊著、《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學出版、2009。

若就當前人流已成為全球性議題的角度而言，則本文所探討的以全球化進程中的殖民化階段為時代背景的兩篇小說，當有助於我們思考相關之議題。其次，川村湊曾指出，在論及樺太等日本的「北方」問題時，包含樺太等地的愛努人在內的先住民族的權利與立場，往往被排除在論點之外，「這顯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的反省只是半調子，而非根本上與本質上的。」[111]同時這更揭示著，不只先住民族，由於樺太具有多民族社會之特徵，因此，未來以大鹿卓的小說為首的樺太文學的研究，包括異種族接觸等視角在內，尚有許多值得充實與深化之空間。另一方面，就台灣文學史的角度而言，立足於東亞，特別是與戰前和台灣同樣曾經被視為日本邊防鎖鑰及據點的樺太的交錯跨界研究，則無疑是理解台灣文學史的新座標之一。

參考文獻

中文

任立譯、H.馬庫色編著、《當代社會的攻擊性》、台北、南方叢書、1987。

李衣雲／林文凱／郭玉群譯、Barry Smart 著、《後現代性》、台北、巨流圖書、1998。

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布魯諾・拉圖著、《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群學出版、2012。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2003。

張時譯、法斯特著、《移民》、台北、皇冠雜誌社、1978。

鄭義愷譯、阿君・阿帕度萊著、《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學出版、2009。

劉靜貞・洪金珠譯、上野千鶴子著、《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台北、時報出版、1997。

日文

111 川村湊、〈朝鮮と樺太ー日常化された「戦争」〉、《帝国日本と朝鮮・樺太》、東京、集英社、2012、672。

浅見淵、《現代日本文學全集 87　昭和小說集(二)》、東京、筑摩書房、1958、413－414、425。

井上英、〈理蕃の友に題す〉、《理蕃の友》創刊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1、1。

今村武志、〈序文〉、《樺太廳施政三十年史》、樺太、樺太廳、1936。

遠藤忠至、〈蟹が缶詰めになるまで〉、《樺太時報》第 36 號、樺太、樺太廳、1940、70－76。

大鹿卓、〈蕃婦〉、河原功監修解說、《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 18【台湾篇】6 野蛮人》、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3—32。

大鹿卓、〈福壽草〉、《現代日本文學全集 87　昭和小說集(二)》、東京、筑摩書房、1958、213—226。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東京、新曜社、2002。

尾崎秀真、〈汝の郷土を愛せよ〉、《理蕃の友》昭和 7 年 2 月號、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2、2－3。

桂長平、〈蕃人操縦〉、《理蕃の友》創刊号、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内、理蕃の友発行所、1932、6。

河原功、〈大鹿卓《野蠻人》解說〉、《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 18【台湾篇】6 野蠻人》、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1－4。

川村湊、〈朝鮮と樺太—日常化された「戦争」〉、《帝国日本と朝鮮・樺太》、東京、集英社、2012、662－672。

川村湊、《南洋・樺太の日本文学》、東京、筑摩書房、1994。

簡中昊、《大鹿卓の蕃地文学研究》、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学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木原直彦、《樺太文学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1994。

桑原靖夫、《国境を超える労働者》、東京、岩波新書、1991。

黃昭堂、《台湾総督府》、台北、鴻儒堂出版社、2003。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　一九二八・三・一五》、東京、岩波文庫、1992。

斎田悟、〈蕃人観光の沿革と其の実績〉、《理蕃の友》1934 年 10 月号、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内、理蕃の友発行所、1934、5。

佐伯怜三、〈樺太島民の性格〉、《樺太時報》第 41 號、樺太、樺太廳、

1940、18－22。

重松生、〈樺太を視て〉、《樺太時報》第 43 號、樺太、樺太廳、1940、96－97。

高橋正男、〈理蕃人・新聞人〉、《理蕃の友》、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2、3。

鄧相揚、《植民地台湾の原住民と日本人警察官の家族たち》、大阪、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2000。

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編著、《霧社事件―台湾高砂族の蜂起》、台北、鴻儒堂、1988。

中山大将、《亜寒帯植民地樺太の移民社会形成―周縁的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植民地イデオロギー》、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4。

日本植民地研究会編、《日本植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東京、アテネ社、2009。

野添憲治・田村憲一編、《樺太の出稼ぎ〈林業編〉》、秋田、秋田書房、1977。

野添憲治・田村憲一編、《樺太の出稼ぎ〈漁業編〉》、秋田、秋田書房、1978。

松田清作、〈樺太の労働事情―殊にその特異性と調整の要務〉、《樺太廳報》第四號、樺太、樺太廳、1937、133－137。

三木理史、〈1930 年代の樺太における石炭業〉、《アジア経済》第 46 巻第 5 号、2005、2－18。

矢内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1934。

山路勝彦、《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

山本祐弘、〈樺太の建築を見る〉、《樺太時報》第 30 號、樺太、樺太廳、1939、83－90。

由井正臣、《大日本帝国の時代》、東京、岩波ジュニア新書、2000。